

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下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研究

周江洪

【摘要】学科交叉融合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催化剂”，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新时代的深刻变化还是社会问题复杂化带来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变迁，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发展。虽然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在我国早已成为共识，并有相应的措施予以推动，但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属性、学科建制细化引起的不可通约性、新研究范式的不恰当运用、科研组织模式和学科生态的尚待改进等也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融合发展。有必要在厚植学科交叉融合基础、强化“分类施策”的有组织科研模式、加强“文科新基建”、完善教育评价改革、优化学术生态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交叉融合；有组织科研；分类施策

【作者简介】周江洪，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光华法学院教授（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新文科教育研究》（武汉），2022.4.63~75

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②。在这一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新兴学科建设和交叉学科建设是重要的突破点。学科交叉融合，不仅对于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对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创新具有突出重要性，而且对于传统学科的创新也同时具有革命性意义。

一、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之必要性

（一）新时代的深刻变化呼唤哲学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发展

百年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③。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匹配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亟待革新，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广袤的待研究领域，一方面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将其作为新的研究对象予以观察和研究；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反省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路径。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缺失，成为

当下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重大挑战。……需要扎根中国的自主构建,需要范式创新的战略迭代。^④实际上,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强调文理融合以振兴人文社科,亦已成为各国的国家战略之一。例如,面向 Society 5.0 的新型社会形态,日本内阁府颁布的《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规划》就明确提出构建以人文社科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融合为基础的、以理解和解决人类与社会的“综合知识”的创造为目的的相关方策。^⑤

(二) 学科边际融合与方法创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观察对象、工具方法变化带来的学科边际融合与方法创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例,“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⑥。事实上,对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人类社会从原来的二元社会(人类+物理空间)逐渐发展成四元社会(人类+物理空间+智能机器+虚拟信息世界)”,“呈现出人际世界虚拟化、物理世界数字化、智能机器泛在化、虚拟世界常态化以及四元空间融合化的重要特征”^⑦。在这一新的空间内,独立知识体系发展的同时,不同知识体系之间包容性特征越发明显,复杂性和整体性研究崛起,大融合的时代也随之来临,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交融互动的新知识体系将应运而生。^⑧

(三) 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应对能力的相对弱化

社会问题的复杂化与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应对能力的相对弱化之间的矛盾也要求走交叉融合的创新之路。包括我国在内,许多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受到削弱、文科自身难以应对社会本身发展的情况日益突出。例如,日本学术会议社会学委员会社会理论分科会 2020 年 9 月 2 日发布的报告指出,虽然日

本内阁通过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立足于时代的变化提出了 Society 5.0 等概念,但随着综合性研究的衰落,日本文社科领域对此的关注和回应并不充分,应开展有组织共同研究予以应对。^⑨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不仅反映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在解释世界方面面临瓶颈,更反映在其作为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的作用发挥明显不够;近代以来建立在“西学”基础上的诸多概念体系,在阐释我国现代化道路中的诸多现象时更是面临叙事能力贫弱和知识体系不自主的问题,甚至有学者将其称为“用‘苹果’的理论来评判‘橘子’”^⑩。如何以中国实践为基础赋予概念新的含义,以及如何在实践基础上凝练新概念,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重要难题之一。

人文领域,也同样面临相对弱化问题。传承和“守城”是人文学科知识管理的主要方式,这与以范式改变和“攻城”为特征的自然科学知识管理方式有着显著的差异。一个是在“守城”的过程中推进改变,一个是在“攻城”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这种状态的存在已经是“天经地义”。但是,“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大学工作者,想要在转基因、环境变迁、人工智能、生物本体的改造等领域进行新的批判,甚至对人类还没有探索到的领域进行人文关怀,就必须让自己的知识管理从‘守城式’变成‘攻城式’”^⑪,否则其应对能力的相对弱化是必然趋势。因此,无论是发现知识体系中的盲点,还是推动“守城”与“攻城”的兼顾,交叉融合都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重要路径之一。如何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课题。

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障碍

(一)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现状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展,很早就已经成为我国学界的重要共识之一。近年来,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新文科建设、交叉学科建设的推动以及《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面向 203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的发布,这一进程不断加速。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就出现了关于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系统专门研究,甚至出现了“交叉学科学”(跨学科学)的新学科,在交叉科学的界定分类、产生机制、必要性、发展特点、方法研究等诸多基本问题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在诸多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的学术进展。^②1986 年,中国科协还成立了“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工作委员会”;1987 年,部分高校发起并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交叉科学联络中心”;等等。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也专门成立了相关研究平台,例如 2000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交叉科学研究中心”、2003 年成立的“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等。^③除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涉及交叉学科的全国性学会也逐步建立。以中国科协的所属学会为例,在“交叉学科”门类下面就有 45 个学会,涉及未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

近年来,在“双一流”建设、新文科建设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学科交叉融合亦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的重要途径,“交叉融合、创新发展”的学科发展模式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发展模式之一。^④在学科交叉领域,设置作为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方向也已成为我国深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重要部署之一。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2020 年设置了交叉学科门类。202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在新设置的交叉学科目录下面设置了国家安全学等新的一级学科方向。2022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交叉学科正式成为第 14 个学科门类。

此外,近年来如火如荼的新文科建设,亦多是立足于学科的交叉融合。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明确指出,新文科建设,其中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结合社会发展新需求、学科交叉融合新趋势、科学研究新成果,加强传统文科专业的内涵建设,建设新兴的文科专业”^⑤。虽然学界对于新文科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比较有共识的一点是,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学科交叉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点^⑥,新文科意味着一种学科的深度交叉和融合,尤其是文科与理科、人文与科技的融合。^⑦《面向 203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对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也作出了专门设计,提出了系列具体举措,强调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⑧。不仅如此,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也已经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点规划。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要求加快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要求围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瞻性、综合性、复杂性等问题,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交叉渗透和融合创新,建设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⑨

(二)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融合发展面临的障碍

虽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学科交叉融合趋势已成必然,但如何进一步推动学科交叉融合,进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障碍。有文献指出,交叉学科发展中存在着因其独特的跨学科特性而无法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组织管理模式方面研究薄弱、研究主体失位和管理体制错位、研究人才储备不足、缺少相应的交流平台和恰当的评价体系等诸多问题。^⑩虽然这些问题目前已得到部分解决,但若将其扩大到哲学社会科学整体而不仅限于交叉学科领域,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下如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和

多元。例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融合,未能在各高校层面得到普遍重视,院系层面支持引导不足,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不充分,教师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性和团队合作意识有待加强,符合跨学科研究特性的评价体系与容错机制尚未建立完善,高质量、前沿性跨学科研究成果不多等诸多难题,仍然存在。就笔者有限的观察而言,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融合发展面临的困难,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属性决定了新领域的开拓动能不足

以人文学科为例,“人文知识本身具有弥散性和多元化特征”^①,而且,因其弥散性特征,其“心境”一旦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特定情绪会“晕开”并成为全局的心理气氛,笼罩住其他与心境产生原因本无关联的人事物,进而使得其知识转型和创新需要更大的成本,传承和“守城”因此也就固化为人文学科知识管理的主要方式。即使在社会科学领域,因我国学科发展历史积淀并不深厚,且社会发展跨越了诸多阶段,各国发展史上面临的问题在我国几乎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在传统学科建制方面,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仍然处在不断构建的过程中,仍有大量的学科问题需要得到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大多在传统学科范围内已有成熟的解决方法,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习惯于用既有的学科方法和知识解决社会问题;而以新的方法、未熟稔的知识面对复杂性问题,反而会面临不少失败的风险。因此,无论是人文领域还是社科领域,通过交叉融合去推动知识体系革新和开拓新领域的动能并不充分。

2. 学科建制背景下知识体系的专业化和精细化,使得不同学科的概念、范畴、原理之间的可通约性变小

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化及其建制为认识和改造

客观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推动了各学科知识体系的快速发展。学科建制下的文科发展,出现了日益分化和细化的趋势。学科细分的这一趋势,虽然促进了精细化研究,但另一方面会形成固化的学科边界,导致学科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概念范畴共享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有观点认为,学科分类体系难以适应当下知识创新的现实要求及未来趋势。^②知识世界的分区愈加细密,使得知识在细化的同时,也被建制化,形成稳定甚至板结的知识结构和逻辑。知识结构和体系被固化之后,可能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不同板块之间的知识区隔被建制化,就会形成内卷化的排异性,对‘他者’知识会产生排斥反应。……二是知识一旦固化、内卷、沉淀,就会按自身惯性和逻辑维系下去,依循自身的知识范式演化。这就造成知识对实践层面的变化失去敏感性,以不变应万变,以僵化的知识应对外部变化。”^③即使在特定学科内部,这一现象也日益突出。以法学学科为例,其内部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学科有时候甚至比法学学科与其他一级学科之间还要“沟壑林立”,同一表述在不同二级学科中的内涵和范畴相差甚远。如法学理论与民商法学中的“法律行为”、刑法学与民法学中的“占有”的概念,等等。当然,在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化的今天,面对新的问题域,各个学科也并不是没有应对之策,但因应的方式多为争取设置独立的学科建制,包括设置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方向。但独立学科的设置,虽然有助于因应某些问题域的某些部分,但却带来更大的可通约性问题。例如,以哲学为例,其研究“散落”在外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二级学科领域当中,各二级学科领域的不可通约性亦是十分明显。^④而且,随着对象视域的扩张和超级复杂化,容易导致学科建制背景下的精准认识的非精准化。每一学科均在自己“织就”的知识体系内运行,且伴随着学科知识体系的成熟固

化和学科自信的逐步积累,学科的阐释能力同样会面临边际效应递减但却不自知的状态。就如同“信息茧房”效应一样,某学科内看到的均是该学科愿意看到的,这不仅会带来学科知识体系的盲点,亦会带来学科间交融的隔阂和障碍。因此,需借助新的工具、方法和机制,打开学科间世界,通过共享概念、方法迁移等来共同面对复杂的客观世界,以解决对象视域的扩张带来的认识困难。

3. 哲学社会科学在理工农医等学科领域场景应用及研究中的作用尚未得到重视

姑且不论一般科技哲学、科技伦理与生命伦理等应用伦理学领域,在理工农医等学科领域中,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的场域及其相关知识体系亦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都需要面对人自身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国家等,自然科学拟解决的诸多技术问题,同样服务于人和社会的发展。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为例,历年发布的重点专项指南中,“社会治理与智慧社会科技支撑”“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重大自然灾害防控与公共安全”“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关键技术及示范”等重点专项领域,均有哲学社会科学参与甚至牵头组织的可能性。从历年立项情况来看,不少重点专项均由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牵头负责。当然,虽说有这些积极的现象,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因其学科属性、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不同,其间的主动合作并不顺利,通常需要经过数年的磨合始能形成高效的科研攻关团队。无论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还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的主动性等,都有进一步加强之必要。

4. 新研究范式的僵化运用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交叉融合的发展

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融合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但是,据不完全观察,有不少成果仅是以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来验证某一学科已成定论的公理等,对于现有学科的冲击力并不十分明显。实际上,在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知识时,既可能存在着学科知识和方法的误植,亦可能存在着为了交叉融合而“物理”融合的现象。或者干脆是基于考核指标之需要,为创新而创新地发表相关论文,实际上只是以既定的模型和数据去验证旧有的学科观点和理论,只是在重复既有的结论、为既有结论做佐证,并没有带来知识体系上的本质创新。例如,近年来大数据方法的运用,亦有不少只是用于验证现有的理论框架,虽然对于学科的自主性有一定的贡献,但其创新性并不充分。此种现象的存在,也是导致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引入新工具新方法采用观望或消极态度的原因之所在。

5. 现有学科、科研组织模式及教育评价体制机制制约了交叉融合的快速发展

关于学科组织模式,有观点认为,“目前组成高等学校基层学术组织的学者们大多是专门化教育的产物和受益者,习惯于专门化教育形塑的知识结构和‘深井式’的研究视野,文科学者之间、文科学者与理工农医学者之间因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无法有效地利用技术工具或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解决所在学科、专业领域的前沿问题和重大问题”^⑤。

在科研项目的组织方式上,虽然各科研管理部门日益强调跨学科课题团队的组成,但在具体的科研活动中,除了重大的整理编纂类项目,不少人文社科的项目仍然习惯于“个体化的学术活动”,尤其是需要理论探索和思想创新的科研项目,跨学科团队的组成并不常见。而且,即使组成了有效的跨学科团队,在项目评审和项目结题验收等环节,亦会面临评审专家的跨学科能力不足等难题。即使组成了相应的科研团队,通常在课题结束或取得相关科研成

果后即告结束,缺乏稳定和持续的开拓能力。或者虽然设立了相关的科研平台,但亦面临议题可持续性、经费可持续性、团队成员学术兴趣迁移、组织体制僵化与问题域复杂多变的矛盾等诸多问题,具备持续活力的交叉融合研究平台并不多见,多数无法形成传统学科发展的积累创新效应。从组织层面来说,国内不少高校采取了学部制度,设置有人文学部、社科学部、经管学部等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的学部,但截至目前,设置交叉学科学部的院校并不多见,这也限制了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评价机制之完善。

优化评价体系,是构建学科交叉融合激励要素的重要前提之一。虽然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亦面临重大改革,但“学科交叉融合的成果评价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不能用旧有的单一指标来评价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③。即使在2020年出台《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之后,各高校都高度重视教育评价改革,也积极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但多偏重于破“五唯”,针对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评价体系探索并不多见。而且,以同行评价为中心的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也会面临交叉学科方向同行偏少、“小同行”精准对应难度颇高等诸多问题。另外,就学科交叉融合而言,其面临的挑战和风险较之传统细分学科问题域更甚,其面临研究失败的风险更大,在容错机制建设上亦面临不少困难。

三、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交叉融合发展的若干路径

面对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国内外一流大学普遍重视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在推动文科创新发展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虽然各校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的做法不一,但总体有五个方面特点:一是高度重视文科发展,确立发展文科的理念,遵循文科发展

规律,多渠道加强支撑保障,加强优势学科建设,在细分学科领域引领学术前沿;二是积极打破传统学科疆界,以创新为切入点,以问题为导向,以跨学科人才培养为支撑,强调跨学科整合,推动文理交叉融合,条件成熟时自主设立相关交叉学科方向;三是强调科研方法创新与范式转型,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是重视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及其活力激发;五是立足于服务国家需求和社会发展开展合作研究和智库建设。结合这些特点,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融合发展为手段,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为目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克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交叉融合发展的一些障碍。

(一) 强化传统优势学科,厚植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基础

只有高质量的优势学科和高水平的学术团队,才能在突破学科边界的基础上产出高水平的创新性成果。一方面,传统学科可以通过时间轴和空间轴两个基本维度重新审视学科发展趋势,以便传统学科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以历史时间轴为线索纵向梳理各学科方向的学术脉络,将为传统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动能。不仅如此,通过时间轴和空间轴的梳理,亦可以发现学科知识体系的盲点、学科方法的弱点等,进而为学科交叉融合、为新的更高水平的开拓奠定基础。当然,在支持传统优势学科发展的同时,还应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避免固守于狭隘的学科视角。原因在于,在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学科所在单位通常会优先支持与本学科直接相关的项目,而不是优先支持学科交叉融合项目,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投入因此会受到削弱。

事实上,在厚植学科交叉融合基础的传统优势学科时,学科建制内部的交叉融合以及跳出学科建制反观学科本身,也是传统优势学科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在学科建制中,通常会细分为二级学科,并以

二级学科为基础设立对应的研究所组织开展二级学科建设。以二级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所架构,一方面推进了学科知识体系的细化,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各二级学科间可通约性的降低。如何推动二级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既是传统学科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是逐步培育学科交叉融合的自觉性、保持学科开放性的重要规训方法之一。不仅如此,在厚植传统优势学科时,跳出现有学科建制反观学科本身,他学科视角、他学科方法的迁移导入,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与旨在迈向交叉学科独立设置的学科导向不同,更关注现有学科的现代化,其目的在于在现有学科建制内推动现有学科的发展。

(二)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分类施策推动交叉融合

事实上,“强化任务导向与鼓励自由探索一直是创新的两种途径”^②，“从国内外科研发展趋势看,从单兵作战到协同攻关,从单一学科研究到组织跨学科研究,从高校自主研究到政产学研相结合,已经成为攻克重大问题的有效科研组织模式”^③。当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融合,因其拟解决的问题对象并不相同,应“分类施策”,采取不同的有组织科研方式。具体来说,可以“问题—领域—学科”多层次分类的方式逐步拓展,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创新科研组织方式,优化平台设置,推进学科交叉融合。

1. 就某一特定问题层面的主题,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学科间交叉融合

该方式亦可被称为“任务型”虚拟交叉学科科研组织,根据科研任务的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调整。^④对于某一特定问题,以特定的项目团队开展集体科研攻关的并不少见,此时设置相关的项目、课题招投标或“揭榜挂帅”即可解决。在这一层面,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自由探索或者依托传统的科研组织方式均可。此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目等项目组织方式是重要的支撑手段。从浙江大学的经验来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目是推动文理交叉融合的重要方法之一——无论是申报过程中的研讨交流,还是随后的项目实施过程,均有利于形成文理学者之间的团队合作和知识共享,对于推动实质性的交叉融合具有重要的撬动作用。而对于科研管理部门来说,可以通过交叉课题培育的方式,推动不同学科间的沟通交流,对相关问题进行预研,为展开重大问题攻关奠定基础。浙江大学自2016年起支持了125个学科交叉预研专项项目,先后组建了13个“大数据+人文社会科学”团队、15个“双脑计划”交叉创新团队、5个文科重大交叉创新团队,鼓励不同学科合作解决专项问题,在学科交叉融合探索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⑤

2. 以博士生培养为中心构筑学科交叉融合新机制

以博士生培养为中心构筑学科交叉融合,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缓解学科间不可通约性的重要方式。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浙江大学探索设立“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已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其中,“文科+X”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牵头设立,以人文社科学科为主,会同其他学部学科,聚焦国家社会发展战略,设置交叉培养方向。具体来说,以人文社科领域的导师为主导师,联合理工农医等其他学科领域的导师,“一生一方案”,针对特定学生设定独立的培养方案,共同培养交叉学科方向的博士生。这一个性化的定制培养,促使导师团队以博士生的培养为纽带推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以项目为纽带的交叉融合促进方式更注重学者间的自由联合和自由探索,而以博士生培养为纽带的交叉融合促进方式,不仅有助于“倒逼”导师团队相互沟通不同学科间的知识、话语体系,而且学生端的“发

问”同样会实现“教学相长”,推动形成更为紧密的学科交叉融合问题意识和方向。

3. 构建会聚型交叉平台,推动传统学术组织体系形成迭代

对于较之“问题”,在视域更为广阔且需持续关注 and 开拓的领域,则可以考虑搭建相关研究平台予以推动。就特定领域的交叉融合而言,以特定项目或特定学生培养为纽带,其推动力有限,需要更为机制化的平台搭建。对此,“传统的‘院系所’组织模式划分了清晰的学科边界,构筑了过高的学科藩篱,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新的科研组织机制尚在探索阶段,总体上并未对传统学术组织体系形成迭代”^③。为此,高校以前瞻视角和超前思维推进学科交叉会聚,是可能的方向之一。浙江大学近年来实施的“学科会聚”研究计划(简称创新2030计划),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该计划打造多学科参与的学术共同体,以及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创新联合体,整合学科、队伍、平台、项目等创新要素,加强跨学科、跨部门的联动协同,通过体系化、有组织的规划实施。^④目前已实施的11个计划中,“亚洲文明计划”“数字社会科学计划”均由人文社科牵头;另外,“双脑计划”的“人工智能+”板块也纳入了语言学、法学、管理学、金融学、教育学、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以“双脑计划”为例,这一创新生态系统被认为是生态化的学术组织治理模式,与传统的组织体系并不相同,“面向未来的新型组织初步特征已经显现:无隔离、倡导融通、组织形式为任务服务、强调自主学习/更新机制、硬目标变为软考核,等等”^⑤。当然,传统的科研组织模式,特别是研究平台的建设,对于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领域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浙江大学近年来推动设立数字沟通中心、数字法治研究院、亚洲文明研究院、共享与发展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就是试图借助传统的科研

组织模式来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

4. 谨慎设置新的交叉学科,避免新的学科壁垒

在条件成熟时审慎地构建新的交叉学科,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发展的重要立足点。在领域导向型的有组织科研中,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学科建制的韧性和基础性。只有存在坚实的学科基础,才有可能通过学科的交融来实现领域的突破;只有领域的突破不断成熟和体系化,才能构建出新的学科。若不能就领域问题实现体系化和知识化,就只是停留在“器用”的特定问题解决层面,无须也难以构建更为体系化和更具稳定性的学科建制。原因在于,“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在概念的形式和内涵上都有很大不同,学科交叉是指既有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合作,而交叉学科实际上是在学科交叉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与现有学科不同的,不能为现有任何一个学科替代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⑥。因此,如果能用项目引导解决、学科会聚计划解决或搭建研究机构平台解决,或者是通过联合培养学生解决相应的学科交叉融合问题,就没有必要设置新的交叉学科,否则又会反过来形成新的学科壁垒。

(三) 夯实“文科新基建”,推动科研范式创新

在交叉融合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以图书馆为代表的文献、数据库为代表的“基建”逐步过渡到以文献、数据库、高校智库、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为代表的“文科新基建”。高校智库的特点是在提供决策咨询的同时,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概念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源泉和体系化建构的“工厂”。而布局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基础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学科知识和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是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载体和范式转型的标志性架构。“社科实验室本身就是学科交叉、文理融合的产物,我们希望实验室可以

在新兴交叉领域问题的研究方面,发挥探索者、引领者、支撑者的作用,由此培育和催生新的学科和学术增长点。”^⑤由于其自身的知识异质性,社会科学实验室摆脱了对单一学科的“路径依赖”,具有探索交叉性和复杂性社会议题的知识创造功能。^⑥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是新的重大转型,更需要各层面的决策者们的魄力,需要有容忍失败的勇气和长期坚持的毅力。毕竟,就如同图书馆的建设一样,不能说某部著作十年无人借阅就无视其价值所在,有可能因为一次偶然的发现或使用就促成了理论视角的变迁甚至引起根本性的观点变迁,进而引领学术之发展。近年来,浙江大学始终秉持“古今会通、东西互动、中外相知、文理交融”理念,大力推进国家级文化精品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有力地促进了人文艺术学科与理学、工学、信息科学的交叉融合,也为“文科新基建”的建设作出了很好的探索。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浙江大学也开始建制地培育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首批遴选了包括神经管理学、高等智能系统与推理、数字体育与健康、数字法治、数字经济等诸多领域在内的10个建设基础较好的实验室予以培育建设。

(四)探索评价体系改革,优化学术生态

在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下,进一步探索评价体系改革,优化学术生态,是哲学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发展的体制保障。从本质上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也是科研创新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实现科研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是重要的途径,具体路径则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更好作用”的结合,反映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就是鼓励自由探索和有组织科研的结合,而其最重要的基础保障就是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

关于构建更加符合跨学科研究成果特点的学术评价体系,浙江大学为此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例如,2020年起实施基础研究长周期考核计划。入选

该计划的人员实施较为宽松的考核目标,六年不考核,并上浮较高的津贴。随着该计划实施的成熟,可考虑逐步从基础研究扩展至学科交叉融合领域。另外,在条件成熟时,可构建交叉学部等学术组织,总体负责跨学科议题的设定、学术成果的评价、跨院系成果的认定、尝试交叉团队的团队考核,等等。此外,在学术生态的构建上,还应当形成有利于发现议题、设置议题的科研组织体系。在资源约束型的背景下,议题设定能力、议题组织方式的判断以及议题攻关组织力,是哲学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发展的重大挑战之一。对此,除了发挥传统的学术委员会或新设的交叉学部学术组织的功能以外,可结合人才强国战略,有意识地培养战略科学家和战略社会科学家,发挥其引领和组织作用,进而使得上述“分类施策”的有组织科研方式得以有效贯彻。

注释:

①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 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1版。

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0页。

④参见任少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7期。

⑤《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规划》,2021年3月26日, <https://www8.cao.gov/cstp/kihonkeikaku/6honbun.pdf>, 访问时间:2022年5月17日。

⑥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⑦吴朝晖:《四元社会交互运行,亟须深化数字治理战略

布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2期。

⑧参见赵怡:《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人文社科发展趋势研究》,《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年第19期。

⑨日本学术会议社会学委员会社会理论分科会“现代社会への応答性を備えた総合的社会理論の振興のために”,2020年9月2日, <https://www.scj.go.jp/ja/info/kohyo/pdf/kohyo-24-h200902.pdf>,访问时间:2022年5月17日。

⑩郑永年:《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186页。

⑪吴岩:《“守城”到“攻城”: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转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⑫参见刘大椿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交叉学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38,47—256页。

⑬刘大椿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交叉学科)》,第28—32页。

⑭参见谢静、韩双森、顾建民:《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样态与生成逻辑》,《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⑮吴岩:《新使命 大格局 新文科 大外语》,《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19年第2期。

⑯参见何莲珍:《新文科与外语学科建设——综合性大学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外语》2021年第1期。

⑰参见赵奎英:《“新文科”“超学科”与“共同体”——面向解决生活世界复杂问题的研究与教育》,《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⑱徐青森:《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大学与学科》2022年第1期。

⑲《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就〈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答记者问》,《光明日报》2022年4月28日,第3版。

⑳参见刘大椿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交叉学科)》,第267—278页。

㉑吴岩:《“守城”到“攻城”: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转向》,

《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㉒参见马骁、李雪、孙晓东:《新文科建设:瓶颈问题与破解之策》,《中国大学教学》2021年1—2期合刊。

㉓张涛甫:《知识的结构化转型与新文科建设》,《复旦教育论坛》2021年第3期。

㉔参见理查德·奥尔森:《社会科学的兴起:1642—1792》,王凯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㉕马骁、李雪、孙晓东:《新文科建设:瓶颈问题与破解之策》,《中国大学教学》2021年1—2期合刊。

㉖刘大椿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交叉学科)》,第277页。

㉗任少波:《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8期。

㉘徐青森:《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大学与学科》2022年第1期。

㉙参见焦磊:《高校如何发力交叉学科研究》,《光明日报》2022年5月17日,第15版。

㉚参见何莲珍:《新文科与外语学科建设——综合性大学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外语》2021年第1期。

㉛赵怡:《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人文社科发展趋势研究》,《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年第19期。

㉜“面向2030的学科会聚研究计划”简介, <http://www.innovation2030.zju.edu.cn/21952/list.htm>,访问时间:2022年5月15日。

㉝袁清、王雨洁、陈婵:《新工科与新文科:“双脑”会聚共创未来》,《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年第5期。

㉞洪大用:《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推进交叉学科健康发展》,《大学与学科》2022年第1期。

㉟徐青森:《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大学与学科》2022年第1期。

㊱参见王震宇、薛妍燕、邓理:《跨越边界的思考:新文科视角下的社会科学实验室探索》,《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2期。